

异域的体验

鲁迅小说中绍兴地域文化英译传播研究

汪宝荣 著



THE EXPERIENCE OF THE FOREIGN

ENGLISH REPRESENTATIONS OF SHAOXING CULTURE
IN LU XUN'S FIC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异域的体验

鲁迅小说中绍兴地域文化英译传播研究

汪宝荣 著



THE EXPERIENCE OF THE FOREIGN

ENGLISH REPRESENTATIONS OF SHAOXING CULTURE
IN LU XUN'S FIC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异域的体验：鲁迅小说中绍兴地域文化英译传播研究 / 汪宝荣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 5
ISBN 978-7-308-14729-3

I. ①异… II. ①汪… III. ①鲁迅小说—英语—文学翻译—研究 IV. ①H315.9 ②I210.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12771 号

异域的体验：鲁迅小说中绍兴地域文化英译传播研究

汪宝荣 著

策划编辑 张一琛

责任编辑 蔡圆圆

封面设计 十木米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金旭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良渚印刷厂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279 千

版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4729-3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s.tmall.com>

序 一

鲁迅研究成为中外显学数十年，既见波澜壮阔，时又支流蔓衍，至今即使要开拓一小片新天地，恐怕已到了只有真正有心得、有学力的专家学者才能染指的地步。本书的出版为鲁迅小说英译研究翻出新的土壤，果实累累，成绩灿然可观。

汪宝荣君 2006 年入读香港大学，即从余游，是我的第一位内地研究生。我不敢以作育之功自居，因为宝荣本来就是天分既高、学殖亦富的英才，从小学业成绩都优异冠绝，来港前已经在浙江省一所重点师范院校任教多年，课余治学不辍，时有论文发表，早见识高力厚，勇猛精进。宝荣在港大五年，勤勉卓厉，朝扬帆而晚摇橹，依时完成两篇坚实、厚重的学位论文，先后获授哲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学成而归，执教上庠，教研著译不辍，遂能跻身国际鲁迅研究学者之列。

当年和宝荣一起选择了这个课题，旨在小题大做，着眼于异域边缘，既董理鲁迅小说英译历史，也做一点翻译文本的专题分析，其间商榷源流，扬挖风雅，恐怕不无庞杂靡蔓。宝荣此番重理旧作，把当年的学位论文增益删削为研究范围集中、搜罗资料赅洽、结论洞见坚实的学术专著，其中钩沉爬梳之功，已至覩缕不遗的地步；而行文深细，观照宏远，尤胜当年，具见思入深沉、调出俊爽的学者气度。先儒云：“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斯之谓也。

宝荣此书，令我想起他在港大陆佑堂的岁月和身影。他当年一直都帮

忙批改翻译本科生的习作和上导修课,是一位鲁直率真的严师,深受同学敬重。我担任港大中文学院翻译科的课程统筹多年,深知治学与教学兼擅的大学老师是多么的难得。宝荣以坚实的双语功底和满腔的教学热忱,广施时雨之化,尤其令我怀念。他这部学术专著面世,流水有声山更绿,我特别为他高兴。

此书付梓在即,宝荣嘱咐我写几句话,不敢推辞。是为序,并志因缘。

潘汉光

2015 年初夏

于香港大学

2012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12JCWW04YB)研究成果

序 二

汪宝荣博士请我为他的新著《异域的体验：鲁迅小说中绍兴地域文化英译传播研究》作序，拿到材料后，我颇感为难。因为我不懂绍兴方言，自然在评价绍兴方言的翻译上不具有发言权。可我又找不出推托的理由，早就答应了的，而且他也没少给我卖力，审稿、撰稿、参加会议等，招之即来，来之能战。考虑再三，我只能来个剑走偏锋，拣我熟悉和喜欢的来讲，既不喧宾夺主，还能成人之美。

汪宝荣博士在“前言”中谈到近年来鲁迅研究受到冷落时，颇为之心疼，士大夫般的忧患意识跃然纸上。他讲得不无道理，但我想，这也可以看作是传统研究已经饱和的一种表现，跨学科研究方法才能为传统的鲁迅研究注入活力，从而开拓出新的学术增长点。事实也是如此：近二十年来，有关鲁迅的翻译研究在国内外升温，如刘禾(Lydia H. Liu)和韦努蒂(Lawrence Venuti)等都在其专著中辟有专门的章节，评述鲁迅的翻译与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翻译研究和翻译学派的文化研究形成了一股合流，相互交融，相得益彰。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中，宝荣这类处于“边缘”的翻译研究得到了从边缘到中心的机会。乘风破浪之时，他甚至在“前言”中大胆预测“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的文学方言及其翻译将是一个新的研究热点”。

过去我们有过一些关于文学方言的翻译研究，如针对老舍作品中北京方言英译的研究，著名翻译家张谷若还曾经以山东方言来翻译英国作家哈代的《还乡》和《德伯家的苔丝》中的英国方言，这些都是非常有益的尝试。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的文学方言及其翻译是否能如作者所预言的那样成为研究的热点，这不是我想关心的。我想在序中特别提及的是作者采用的研究方

法,他没有特意去张扬某种理论,而是试图回答以下四个核心问题:1. 鲁迅小说通过哪些个人和机构的努力得以旅行到英语国家? 2. 文本旅行到达目的地后效果如何? 是否获得目的地读者的赏鉴甚至欢迎? 3. 译者如何翻译鲁迅小说中异域情调浓厚的绍兴方言及文化? 如何处理“力求其易解”与“保存着原作的风姿”之间的冲突? 4. 为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应如何翻译中国文学作品中蕴含的地域方言及文化? 这几个方面的问题看似不难,但要回答好却绝非易事。作者在书中对上述问题的阐释是较为令人满意的,我想读者也应该会跟我在这方面达成共识。他的这部著作虽然以方言切题,但对翻译研究的诸多方面,如作品、机构、个人、方法、传播等均有涉及。其实,若要从严格的方法论角度看,上述问题主要是从两条主线,即鲁迅小说中绍兴方言英译的规定性研究与描述性研究来展开的。作者的问题意识很强,语言老到,能穷尽资料,分析入微,给很多做翻译研究的年轻学者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作者在“后记”中表述了自己的写作期望:考察译者如何翻译蕴含异域情调的绍兴方言及文化,让说方言的“中国文化他者”发出声音。这一方面充分体现出他敢啃硬骨头的精神;但另一方面,这也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术课题,因为英语中从来就不存在绍兴方言的因素,这无疑会给研究的定性、定量分析带来许多困难,甚至是挑战。要让绍兴方言与文化在鲁迅小说的英文翻译中发出声音,需要从不同的文化思维模式、方言的话语体系,以及移植或新造语汇等诸多相关因素来加以考虑。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迈出了第一步,就会有第二步,就会有不同的人来继续研究。这样不断深入的研究在目前我国翻译研究领域是普遍阙如的。我为汪宝荣博士的这部力作喝彩,也希望他的研究不断拓展,更期待在不久的将来他有新作问世!

罗选民

2015年5月18日于清华园

前言

鲁迅(1881—1936)是无可争议的“中国现代文学之父”，尤以振聋发聩、促人深省的先“呐喊”、后“彷徨”的小说著称于世。他既汲取中国白话小说精髓，又借鉴西方现代小说技法，中西共治一炉，融会贯通，终成中国现代小说开山宗师。美国汉学家韩南(Hanan, 1974: 53)认为，“相较其他作家，鲁迅的每一篇小说更是一种技巧上的大胆创举，一种追求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的新尝试。……正是由于他对技巧执着的关注，以及我们在其作品背后感受到的那种独特的情感和世情洞察，才使他的三十几篇小说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表现力最强的艺术品”。

英年早逝的鲁迅对中国现代史的影响既广泛又深远，时至今日仍可望见其“高大的后影”，但凡研究现代中国历史、社会、文化和文学的，都无法绕过这位巨人。因此，鲁迅研究(又称“鲁迅学”)在20世纪70—80年代成为一门显学，国内外研究者灿若繁星，中外文著述汗牛充栋。到了90年代，因政府及体制助推、支持力度减小，国内鲁迅研究有所降温，进入一个“较为沉滞的时期”，并出现“民间性凸显、小众化分野的趋势”(张福贵, 2013: 163)。进入21世纪之后，“和谐”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旋律，鲁迅旨在暴露“病态社会”、“揭出疾苦”、“投枪匕首式”的作品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有关部门以其作品题材不适合当下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年轻学子颇觉“晦涩难懂”为由，不断地把鲁迅作品从中小学语文教材中“微调”出去，导致鲁迅“高大的后影”在青年学子眼中渐行渐远。国内鲁迅研究则暴露出重复阐释、思想创新乏力的问题，处于“一种重复性和悖论式的状态”(张福贵, 2013: 161)。与此同时，国外鲁迅研究态势也有重大变化。仅就鲁迅研究重镇之一的美国而言，20世纪70—80年代风头

颇健的几个领军人物,不是退休或离世,如威廉·莱尔(William Lyell)、夏志清、韩南(Patrick Hanan),就是退出研究第一线,如李欧梵、王斑,转而从事宽泛的中国文化研究。

从70—80年代的“骤热”到近几年的“遇冷”,国内外鲁迅研究可谓潮起潮落,载沉载浮。当下,国外鲁迅研究看似风光不再,但仍有一些默默坚守的研究者和推动者。2012年,美国亚洲研究学会推出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周杉(Eva Shan Chow)的新作《记忆、暴力与辫子:鲁迅对中国的阐释》;翌年,澳大利亚华裔学者黄乐嫣(Gloria Davies)的《鲁迅的革命:在乱世写作》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美籍华裔学者 Eileen J. Cheng 的《文学余烬:死亡、创伤及鲁迅对伤逝的拒绝》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2014年春,笔者从可靠渠道获悉,声誉卓著的荷兰布里尔出版社(Brill Press)与国际鲁迅研究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Lu Xun Studies)合作创办了英文半年刊《鲁迅研究》(*Lu Xun Studies*),编辑部设在北京鲁迅博物馆,正在为出创刊号向全球知名学者约稿。2015年年初又承该刊编辑葛涛博士相告,创刊号不久即可问世。三本厚重学术专著的接连推出和一本专业学术期刊的创办,发出一个明确无误的信号:国际鲁迅研究没有过时,鲁迅没有被打入学术冷宫!

鲁迅小说的细心阅读者或研究者,可能会察觉鲁迅时常有意无意用绍兴方言措辞造句,令作品散发出绍兴方言独特的韵味、古越文化淳厚的气息。说是“有意”,一方面是因为鲁迅深知方言土语根植于民众的口头语言,鲜活生动,具有文学表现力,是值得开采的语言宝藏,可以提炼加工成别有趣味的文学方言(literary dialect)。鲁迅小说,尤其《呐喊》中收入的大部分篇目,多为乡土题材,方言的运用既可凸显地域背景,营造氛围,再现地域文化,也可刻画人物,起到夸张、幽默、讽刺等文学效果。另一方面,鲁迅创作小说的20年代正处于现代汉语成型期,作为几千年正统文学语言的文言遭到扬弃,但是胡适、鲁迅等“五四”启蒙者大力倡导的白话文仍很稚嫩,其词汇和语言表现力尚贫瘠乏力。写作时词不达意、枯肠搜遍之际,鲁迅不愿时时求助于用起来得心应手但一般民众看不懂的文言语词,因此轻车熟路改造、利用家乡方言成为必然的选择。鲁迅在《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一文中指出:“方言土语里,很有些意味深长的话,我们那里叫‘炼话’,用起来是很有意思的,恰如文言的用古典,听者也觉得趣味津津。各就各处的方言,将语法和词汇,更加提炼,使他发达上去的,就是专化。这于文学,是很有益处的,它可以做得比仅用泛泛的话头的文章更加有意思。”(《鲁迅全集》(第6卷),2005:100)说是“无意”,是因为

一位作家在故乡自然习得的地域方言及文化会内化为“作家惯习”，故乡方言即便在其远离故土写作时也会频频闪现在头脑中，从笔端汩汩流出。鲁迅一生的三分之一在古越文化的熏陶下度过，他是在越中乡语的呢喃声中长大和读书识字的，绍兴方言是他的如影随形的母语。因此，鲁迅在完全无意识中也会写出具有方言色彩的语句。

尽管鲁迅在小说创作中有意识运用绍兴方言，提炼出独具个性的文学方言，书写了绍兴的地域文化，但是积极倡导语言文字改革的他充分意识到方言的局限性，即限于一隅的地域方言不宜未经提炼加工即直接取用，或虽经作家精心改造为文学方言，也不宜大量运用，以免降低作品对读者大众的及性。清末文人韩邦庆（1856—1894）用官话叙事、用苏白描摹人物对话，写成被胡适誉为“吴语文学的第一部杰作”的《海上花列传》，但1894年出版后即遭遇“致客省人几难卒读，遂令绝好笔墨竟不获风行于时”的困境，所幸后由现代著名小说家张爱玲译成普通话。鲁迅认为，海上“才子佳人小说”中吴语泛滥给读者大众造成阅读障碍，有此前车之鉴，他在小说中运用属于吴语系的绍兴方言是高度节制的。从研究者角度看，鲁迅对方言的有意识运用即文学方言才是有研究价值的，但是由于方言语词一般只是零星散落于叙事语言和人物对话中，我们很难将其有意、无意运用方言的情形区分开来。

在重点研究鲁迅思想和作品的“中国鲁迅学”体系中，鲁迅作品中的文学方言及其蕴含的地域文化是一个相对冷门的边缘课题，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内文学评论界对文学方言的看法存在分歧，“新中国成立以来，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过”。语言学家们大声疾呼语言必须规范，反对作家们在文学创作中运用方言，而作家们却认为“文学语言在本质上是反规范的”（汪如东，2004：29）。在语言学家的这种强势理论话语的压制下，对作家运用的文学方言的研究必然被边缘化，很难有大量成果。相比之下，对鲁迅文学方言的研究还算活跃，这是因为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鲁迅研究一直居于国内学术和文化的中心位置（张福贵，2013：162）。笔者在《中国知网》中以“鲁迅作品中的方言”为检索项进行篇名检索，发现只有10多篇期刊文章严格符合检索要求。事实上，鲁迅作品中方言或地域文化注释类著作已颇为可观：谢德铤（1979，1993）、倪大白（1978，1981）、裘士雄、黄中海、张观达（1985）、傅建祥（2003）、任宝根（2005）等。此外，近几年绍兴方言及绍兴文化（也称“越文化”）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包括张荷（1995）、侯友兰（2006）、吴子慧（2007）、王敏红（2009）、屠国平（2012）等。以上著述多出自绍兴籍或有绍兴生活背景的学者之手，涉

及的广度、深度不等,却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鲁迅既是卓有成就的翻译家,也是颇有创见的翻译思想家。在《题未定草》一文中,鲁迅指出:“……翻译……和旅行外国,是很相像的: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风姿,但这保存,却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看不惯了。”(《鲁迅全集》(第6卷),2005:364-365)此处鲁迅讨论的是外国作品汉译;他认为译作应尽量保存“原作的风姿”,这样国人看翻译书就宛如在外国旅行,能切实感受和欣赏“异国情调”。确实,翻译是“文本旅行”,是“从一个文本到另一个文本、从主体文化去往他者文化的一次旅行”(胡安江,2007)。通过翻译,鲁迅小说才能旅行到外国,感受异域的人们投来的眼光,无论是漠然、欣然,还是愕然;通过翻译,外国读者才能感受到“东方文化他者”的异域情调,体验鲁迅小说中用绍兴方言及绍兴地域文化构建的乡土话语世界。显然,对被中西文化鸿沟隔开的外国读者来说,绍兴方言及文化正是“异国情调”,那么译者该如何处理呢?鲁迅指出了译者面临的两难处境:既要“保存着原作的风姿”,又要“力求其易解”。

熟悉西方翻译理论的读者一眼就能看出,本书主标题取自法国学者安托万·贝尔曼(Antoine Berman)的重要论著《异域的体验:浪漫主义时代德国的文化与翻译》(1992)。贝尔曼把翻译视为文化自我与文化他者之间的关系,也即“与其他文化开展对话的条件”,而这种对话的表征是原作的语言文化特质出现在译作中(Berman,2009)。根据这一理论,译者理解、翻译鲁迅小说是一个阅读、诠释“东方文化他者”的过程,通过译者的介入式诠释,尤其对原作异域情调的保存,英语读者才能体验鲁迅小说中的“东方异域情调”,才能“与中国文化开展对话”。在此意义上,《异域的体验》这个书名完美诠释了本研究的主题。

本研究有两个重点:一是全面梳理鲁迅小说通过翻译旅行到英语国家的历史轨迹;二是考察译者如何翻译蕴含“异域情调”的绍兴方言及文化,也即如何再现鲁迅运用的文学方言,让说方言的“文化他者”发出声音。为此,本书试图回答以下四个核心问题(每两个问题对应一个研究重点):

(1)鲁迅小说通过哪些个人和机构的努力得以旅行到英语国家?

(2)文本旅行到达目的地后效果如何?是否获得目的地读者的赏鉴甚至欢迎?

(3)译者如何翻译鲁迅小说中异域情调浓厚的绍兴方言及文化?如何处

理“力求其易解”(即通顺或“可接受性”)与“保存着原作的风姿”(即忠实、准确或“充分性”)之间的冲突?

(4)为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应如何翻译中国文学作品中蕴含的地域方言及文化?

目前国内外对鲁迅小说中绍兴方言及文化翻译问题的学术关注很有限,仅见期刊、硕士论文若干篇,且大多出自绍兴籍学者之手。究其原因,迄今为止鲁迅小说的主要英译者,无论姚克、杨宪益等本国人士,“中国通”肯尼迪,还是美籍华裔译者梁社乾、王际真,或是威廉·莱尔、蓝诗玲(Julia Lovell)等英美汉学家,都不熟悉绍兴方言和绍兴地域文化,甚至没有充分意识到鲁迅写小说时运用了绍兴方言(莱尔是例外)。因此,在几乎所有英译本中,鲁迅作品的文学方言特质由于译者倾向于采用方言标准化或方言淡化策略而基本上被遮蔽、抹去,甚至因为译者不识绍兴方言而被误读、误译。在现有英译本中,鲁迅小说文学方言翻译的“文本痕迹”留存不多,因而不易确定,这无疑挡住了很多研究者探究的脚步和兴味。正由于此,本课题才更有研究意义,能够为我们了解鲁迅作品英译现状提供一个新的维度和视角。毋庸置疑,本课题研究者须熟悉绍兴方言,知晓绍兴地域文化。美国文学方言研究专家艾夫斯(Ives, 1971: 162)指出:“假如研究者事先不了解作家的口音,却试图去分析其文学方言,想要得出有效的结论是几乎不可能的;但如果被研究的作家的方言碰巧就是研究者本人的方言,就不会有困难。”笔者对本课题有浓厚的兴趣,接受过良好的学术训练,又是土生土长的绍兴人,因此自忖是这项研究的合适人选。

在西方语言学界和翻译学界,包括文学方言在内的“语言变体”及其翻译研究是一个热门课题,近百年来大量专著、期刊论文、专书章节和学位论文得以出版、发表。早期研究大多关注语言变体的可译性问题,近年来则从文学文本学、社会语言学、修辞学、方言学、女性主义、后殖民研究等视角考察语言变体及其翻译,关注马克·吐温、福克纳、哈代、海明威、斯托夫人等擅用方言写作的英美作家,着重研究语言变体经过翻译过滤之后保留或变异的程度。这种跨学科、多视角研究大大加深了人们对文学方言的认识,推进了翻译实践。在中国,汉译西方经典文学历史悠久,成绩斐然,但近年来才有学者关注这些作品中文学方言的翻译,韩子满(2004)、王艳红(2012)两本专著已出版。至于中国文学作品中文学方言翻译研究,除几篇期刊、学位论文外,尚不见专著问世。可见文学方言翻译研究在国内翻译研究中处于边缘化地位。

总之,本研究是鲁迅研究和翻译研究中的一个交叉边缘课题,在从事鲁迅

本体研究或翻译研究的学者看来,也许学术价值不大。然而,在全球化日益扩大、加深的当下,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也应涵盖地域文化这个维度,不仅要让外国读者了解、欣赏中国文化,也要让他们倾听说方言的“中国文化他者”发出的声音。笔者预测,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的文学方言及其翻译将是一个新的研究热点。

本书的写作基于笔者于2008年夏在香港大学答辩通过的哲学硕士论文——《鲁迅小说中绍兴方言英译研究》。这次成书,不仅按浙江大学出版社的稿件写作要求重排体例格式,而且内容经过较大的充实、修改和更新:对原论文第一、三、五章作了小幅度修改,对第二、四章进行了大幅度充实和修改,更新充实了“参考文献”,增补了“前言”、“附录”、“索引”和“后记”。笔者自知,虽已竭尽所能,书中仍难免错讹,责任自然在我。

笔者有幸在香港大学潜心修读五载,在2011年国庆后一周,捧着两个沉甸甸的学位载誉而归。衷心感谢香港大学慷慨提供五年全额奖学金,使我得以心无旁骛地完成学业及这本小书;感谢导师潘汉光教授对我的悉心指导、热情支持和绅士般的胸襟和气度;感谢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单周尧、杨玉峰、陈万成、王爱和、黎活仁诸位先生的教诲、厚爱和关心,也感谢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办公室诸位同事的热情帮助,感谢香港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为本课题研究提供的图书资料和出色的服务。

凡 例

一、凡所引鲁迅小说原文,页码均依照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鲁迅小说全编》。例如,“(《离婚》:306)”表示该例引自《离婚》,在《鲁迅小说全编》中第306页。

二、因涉及译本较多,为便于区分和读者查找方便,统一用译者姓氏注明译本和引文出处。例如,“(Leung: 37)”表示该例引自梁社乾译本第37页。

三、为与正文(宋体)有所区别,正文中缩进编排的引文采用仿宋体,小说原文示例采用楷体。

四、凡所引原文及译文示例,语词的粗体、斜体及着重号均为笔者所加,以突显文中对比评析部分。

五、凡所引原文及译文示例中,“【……】”表示引用时对原文省略的部分,“[…]”表示引用时对译文省略的部分。

六、除非另有注明,分析译文时均依据 <http://www.onelook.com> 网站上权威英语词典提供的释义,包括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Cambridge Dictionary of American English*, *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等。

七、书中人物近身照主要来自网络资源,梁社乾的照片由其美国直系亲属惠赐。

目 录

引 论	1
第 1 章 规定性与描述性翻译研究	6
1.1 从“规定”转向“描述”	6
1.2 描述性翻译研究概述	8
1.3 描述性翻译研究的成就与不足	13
本章小结	16
第 2 章 鲁迅小说英译历程描述性研究	18
2.1 七种译本简介	19
2.2 译者背景简介	21
2.3 英译历程综述	30
本章小结	65
第 3 章 鲁迅小说中的绍兴方言与绍兴文化	71
3.1 绍兴方言与绍兴文化概说	71
3.2 地域方言、社会方言与文学方言	77
3.3 鲁迅运用绍兴方言的原因	80
3.4 鲁迅小说文学方言的表现手法	86
3.5 绍兴方言构建的乡土话语世界	91

3.6 鲁迅小说中绍兴方言词判定办法	93
本章小结	96
第4章 鲁迅小说中绍兴方言翻译规定性研究	98
4.1 国内外文学方言翻译研究述评	98
4.1.1 文学方言的运作机制及其可译性	99
4.1.2 常用的四种文学方言翻译策略	103
4.2 鲁迅文学方言翻译批评标准	115
4.3 绍兴方言翻译批评	118
4.3.1 方言谐音双关	118
4.3.2 地方名物类方言词	136
4.3.3 地方民俗类方言词	143
4.3.4 地方概念类方言词	147
本章小结	155
第5章 鲁迅小说中绍兴方言翻译描述性研究	160
5.1 方言词翻译规范描述性分析工具及参数	160
5.2 绍兴方言翻译描述性分析	163
5.2.1 地方名物类方言词	163
5.2.2 地方民俗类方言词	169
5.2.3 地方俗语类方言词	174
5.2.4 地方詈辞类方言词	182
本章小结	195
结 论	203
主要参考文献	213
附 录 鲁迅小说中绍兴方言词释义表	232
索 引	244
后 记	248